



大冒险家哈同

李道昌著

群众出版社

K295.1/4

大冒险家哈同

李昌道 著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736860



群众出版社

一九七九年·北京

736860

大冒险家哈同

群众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贵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2印张 40千字
1979年10月第1版 1979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01—100000册 定价：0.15 元



前 言

我国广大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经过革命斗争和艰苦劳动，建设成了社会主义的新上海。它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重要基地，近代我国工商业的中心，世界著名的大城市之一。但是，旧上海，特别在鸦片战争以后，它却是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政治、经济和文化侵略的重要据点，是国内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奴役压榨广大人民的场所，是“冒险家的乐园”。这本小册子写作的目的，是根据历史事实，采取史话的形式，通过对帝国主义分子——大冒险家哈同一生的罪恶历史的叙述，揭露帝国主义、冒险家在旧上海的罪恶活动，和它们如何与中国军阀、官僚，狼狈为奸，从政治、经济、文化上共同奴役压榨中国人民和破坏我国革命运动等罪行。我们懂得昨天，正是为了立足于今天，继承革命的传统，树立革命的理想，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四化献身，创造一个光辉灿烂的明天。

本书在编写的过程中，曾得到很多方面的支持，有的供给了重要的文书资料，有的提供了自藏的有关证件，有的就其亲身的经历撰写了回忆录，等等，对此谨致谢意。

由于没有经验，水平低，书中不免有很多不妥之处，希望读者给以批评和指正。

宋光同志曾领导过本书的编写工作，以志纪念。

李昌道

1979年4月

目 录

登上洋行经理和租界董事的“宝座”	(2)
贩卖鸦片大发横财	(6)
强占和反抗	(8)
层出不穷的掠夺花招	(13)
封建统治阶级的“洋大人”	(18)
军阀的后台老板	(22)
复古逆流中的急先锋	(26)
上海“大观园”	(34)
人面兽心	(38)
伪善者	(43)
强建“罗苑”	(48)
狗争骨头	(53)
步父后尘的乔治·哈同	(55)
一唱雄鸡天下白	(58)

06 34 / 23

在上海的延安中路铜仁路口巍然矗立着一座宏伟瑰丽的建筑——上海工业展览馆，这座大厦的旧址，就是解放前上海最大、最华丽的私人花园——“爱俪园”。它曾经是帝国主义分子——大冒险家哈同盘踞的地方，所以有人又叫它“哈同花园”。哈同于1873年（21岁）到上海，至1931年（81岁）死时为止，一直都在上海，他在上海整整地鬼混了六十年之久。他的一生，是贩卖鸦片、强占地皮、勾结官府、破坏革命、投机诈骗、压榨租户、喧嚣复古、散布迷信的一生，也是残害中国人民的一生。

哈同在上海担任过法租界公董局和公共租界工部局的董事，做过英帝国主义驻华法庭的陪审员；与清王朝的慈禧太后、宣统皇帝结拜过过房亲，是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高官”、“贵客”，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洋大人”。哈同依仗帝国主义在华的种种特权和中国军阀、官僚的恶势力，大肆掠夺中国人民的土地和珠宝文物，在上海为所欲为，无恶不作。1901年独资开设“哈同洋行”，专搞房地产投机勾当。1909年以八十万银元巨资建成占地二百多亩的私人花园——“爱俪园”，作为穷奢极欲，追求享乐的乐园；勾结军阀、官僚，破坏中国人民革命运动的据点；喧嚣复古，散布毒索的场所。园内有什么亭台楼阁，假山池塘等景色一百多处，故有人说它是上海的“大观园”。1918年又在杭州强建私人

别墅“罗苑”。他还大言不惭地把爱俪园西边一条马路自命为“哈同路”（现为铜仁路）。

南京路两旁的里弄、大楼，凡冠以“慈”字的，如“慈淑大楼”、“慈裕里”、“慈庆里”、“慈顺里”、“慈昌里”、“慈丰里”、“慈永里”……都曾是他霸占过的房地产，所以有上海“地皮大王”的臭名。这个赤手空拳来上海的外国小瘪三到1931年一命呜呼时，据不完全统计，所掠夺的不动产有土地449,098亩，市房812幢，住房544幢，办公大楼24幢，旅社饭店4幢，仓库3幢；所掠夺的动产有无数的金银首饰珠宝、汉玉、唐代陶器、明代雕刻、唐伯虎名画等文物。所有的动产和不动产，据英国领事署1931年的大概估计共值四百万英镑。

哈同在上海混了六十年，从一个摇尾乞怜的外国小瘪三一变而为亿万富翁，究竟他是怎样暴发起来的，是用怎样的无耻伎俩掠夺中国人民的血汗呢？究竟他在上海干了哪些罪恶的勾当呢？

登上洋行经理和租界董事的“宝座”

哈同全名雪拉斯·阿隆·哈同，又名欧司·爱·哈同。犹太人，1851年生于巴格达城（现为伊拉克共和国首都）。出身于投机商人家庭，他的父亲叫爱隆·哈同，曾在土耳其的老沙逊洋行做过事，生有子女六人，哈同排行第三。哈同五岁时，随他的父亲迁居印度孟买，二十一岁，独自一人到

香港，因他父亲的老关系进老沙逊洋行香港分行当小职员。

哈同从小受着投机诈骗、阴险毒狠的投机商人的“家庭教养”，所以他在涉入国际市场不久，就喋喋不休地说：“吾人既不远数万里来异国，当图大业，欲图大业，必先凭借地利”，这就是说要进行“冒险”勾当，大发其横财，一定要找个便于投机诈骗的好地方。这个地方，哈同认为就是当时的上海。因为，当时上海的海关控制权已落到帝国主义列强手里，是个殖民地化的国际市场，华洋杂处的大都会，而且已有不少帝国主义冒险家在这里脑满肠肥了。于是在1873年，这个二十一岁的外国小瘪三离开香港，伴随着嘴咬雪茄的大商贾、披着黑外套的传教士、挂着佩剑的外交官等成群结队的来到当时是“冒险家的乐园”——上海。

哈同到上海后，最初仍在老沙逊洋行上海分行当个小职员。后来，由于哈同为人手毒心狠，诡计多端，很受洋行老板的“器用”，不久就被提拔为洋行中的高级职员，掌管租赁、订立契约等大权。为了取得发展自己冒险事业的靠山，哈同一到上海后，马上向老牌帝国主义英国领事署登记，取得英帝国主义的庇护。1886年转入新沙逊洋行做事，共达十四年之久，其间“擢升要职”，直到大班（经理）之职。在转入新沙逊洋行那一年，又向法国领事署登记，取得法帝国主义的庇护；同年与中国籍妓女罗迦陵结婚（罗迦陵，福建人，1863年生于上海九亩地）。1887年法国领事署拉哈同做法租界公董局的董事，前后达十年之久，后来，美、英帝国主义也拉他做公共租界工部局的董事，英国领事署还任命他为英国驻华法庭的陪审员。法、美、英帝国主义为什么这样

“青睞”于这个当时还不过是洋行高级职员的呢？这要从1883年—1885年的中法战争谈起。

1883年法帝国主义首先向越南发动了侵略战争，取得了对越南的所谓“保护权”以后，接着又从陆、海二路侵入中国，爆发了中法战争。当时的清王朝慈禧太后，在人民的压力下，不得不颁布宣战诏谕，派张之洞接任两广总督，起用冯子材、王德榜等将领抗击法国侵略军。1885年冯子材部于谅山大败法军，而后太平天国旧部刘永福所率领的黑旗军又在临洮大获胜利，击退了法国侵略军的进犯。这一消息传到巴黎，法国议会大哗，新登台不久的内阁总理，也就是发动这次侵略战争的祸首茹费理被迫辞职。这时，上海各个租界特别是法租界内的外国“侨民”大为恐慌，那些以吸血为生的大商贾、传教士、外交官以及流氓、冒险家四处窜逃，而沙逊洋行的老板，更是象热锅上的蚂蚁坐立不安，这就造成了租界内一度极为混乱的局面。但当时的哈同却与这批人不同，他知道清政府是离不开帝国主义的，有时会摇摆一下，但只不过是暂时的现象，最后还是要向帝国主义作进一步的勾结，于是他向沙逊洋行老板献计谋策，主张借此时机以低价多置地、多造房屋，等等。中外商人看见沙逊洋行老板此时不但没有逃跑反而大兴土木，扩展土地，所以渐渐“人心镇定”。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帝国主义稳定了租界内的混乱局面，巩固了帝国主义在华的统治。没有多久，清王朝与法帝国主义讲和停战，并在天津订立了“中法新约”，承认法国侵占越南；允许法国在云南、广西通商等等。这时不但以前迁出租界的人都搬了回来，而且浙、闽等地又有很多人移居上海租界以内，使房地产的价格猛涨几十倍，沙逊

洋行的老板一下子就掠夺暴利几百万两。哈同这种象赌棍押宝似的冒险伎俩，深得帝国主义的赞扬，于是在中法战争结束的下一年，法帝国主义公董局就聘他作董事。他的走狗、奴才在一篇《哈同先生兴业记》中无耻地大吹大擂此事说：

“当清光绪甲申中法以越南事失和，一时谣逐烦兴，租界居民有迁居者，沙逊肆主以赁舍多空之忧，先生固言无伤，且就此多置地建屋……沪上莫不服先生之先见，越年遂被举为法公董局董事，盖以所建议有维持地方之效，故众口交推也。”

哈同在上海滩第一次大显冒险家的身手，既捞到不少铜钿，又尝到了公董局董事的甜头，因此，他的冒险胃口更大了，于是又在福州路以北南京路一带兴风作浪。那时上海在广东路、河南路、福州路之间较热闹，而福州路以北南京路一带，人口稀少，地价便宜，面对着这种情况，哈同认为：

“南京路居虹口南市之中，西接静安，东达黄浦，揽其形势定为全市枢纽。其繁盛必为沪滨冠。”但这一带属于公共租界管辖之内。于是他又竭力与英、美帝国主义相勾结，用低价在南京路一带掠夺了不少地皮，并以六十万两银元巨资用铁藜木铺南京路。没有多久，随着英、美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日益扩展，这一带果然繁荣起来，逐渐成为全市热闹的地区。哈同这种投机取巧的“才能”和在南京东路用铁藜木铺马路的伎俩，为英、美领事署所欣赏。因此，1897年公共租界也拉他做公共租界工部局的董事。后来，英帝国主义还任命他为英帝国主义驻华法庭的陪审员。从此，这个外国瘪三更是飞黄腾达，嚣张一时了。在冒险家乐园——上海，大肆施展无耻伎俩。

贩卖鸦片大发横财

哈同初到上海时，是一个身无分文，赤手空拳的洋瘪三。关于这一点，就连既是哈同洋行的经理，又是哈同花园的总管姬佛陀（又名姬觉弥，号北陵居士，江苏睢宁人）也无法否认地说：“哈同以孤露之身，孑然来华，担囊无资。”可是，为什么哈同在上海鬼混了六十年，就成了亿万富翁和海上名流了呢？这个问题，有许多形形色色的奇谈怪论，有些军阀官僚说他“创业之速，拥资之巨”是“别有神秘矣”；反动派的御用文人写诗作文为他吹捧，说他“赤手空拳，蔚成大业”是由于“澹泊俭素，刻苦勤劳”；还有一种荒诞说法，是因为他买了彩票，中了头奖的结果；而姬觉弥也为主子帮腔，说“哈同不贪洋药（鸦片）之利”。哈同自己也假惺惺地说：“洋药匪特戕贼人形体，抑中西失和之根因也，虽饶子息吾不愿为也”。事情果真是这样的吗？我们不妨查一下哈同的起家历史，来看看到底他是怎样起家的。

任何尊重事实的人，只要略查一下哈同来到上海以后的历史，很快就会发现：哈同进沙逊洋行不久，他就利用房地产投机所得的钱投放高利贷、经营股票投机、加入赛马赌博的跑马总会，大肆榨取中国人民的血汗。更主要的是他和沙逊洋行老板合伙贩运鸦片，榨取暴利。

哈同来中国的时候，正是帝国主义以大量鸦片输入中国，毒害中国人民的时期。在鸦片战争以前，鸦片输入中国

多少还是偷偷摸摸进行的，在战后就没有丝毫约束了。1843年上海开埠后，上海的出口贸易扶摇直上，到五十年代之初就超过了广州，成为全国最大的商业城市，原来设在别的地方的外国洋行也纷纷迁来上海或在这里设立分行。同时，上海的鸦片输入也以更大的规模进行着，成为鸦片贩子的集中地和鸦片转口的地方了。上海经营鸦片的大本营是沙逊洋行，其中以新沙逊洋行贩毒的规模最大。它每年用英国的轮船，以全副武装的匪徒做保护，公开地从印度将满载鸦片的大轮船开进黄浦江，再用大驳船将鸦片运到青浦路口的码头上。然后，以外国武装警察驱使码头工人，将成千上万箱的鸦片搬进一座占地三亩多、四层楼高的大仓库里。沙逊洋行每年从印度输入的鸦片，其数量之多，甚为惊人。就以1900年八国联军侵略中国，各洋行的进口业务一度下降的年份来说，它还输入了二十八万多斤，价值关银一百八十万两。哈同的沙逊洋行鬼混了达二十七年之久（老沙逊洋行十三年，新沙逊洋行十四年），又是新沙逊洋行的大班，怎么能说“哈同不贪洋药之利”呢？

哈同在贩卖鸦片的无耻勾当中，非常奸猾狡黠，不仅在平时，就是在清政府所谓“禁烟”时，也大发横财。如有一次清政府在人民的压力下，不得不颁布所谓严禁鸦片输入令，上海道台也煞有介事出告示：“限禁烟馆”，规定“城厢内外大小各烟馆，在六个月内闭歇”，同时又致租界领事照会，要求“工部局、公董局协同查禁闭歇租界内的烟馆”。清政府的所谓“严禁”鸦片令颁布后，上海有些烟土行恐存货被禁，纷纷抛出存土，使得鸦片的大盘价格骤跌十数道。当时的哈同，不仅不把清政府所谓的“禁烟令”看在眼里，

反而乘机打劫，大捞一把。他一面将存有的一百多箱（一万多斤）鸦片压住不动，一面又把中国军阀、官僚存放在他手中共达一百万两银子全部买进鸦片。果然，清政府的禁令又成空文。不到几个月，因鸦片货物缺少，再加上吸毒者纷纷匿居到帝国主义包庇走私、贩售鸦片的罪恶场所——租界内，使租界内鸦片的需要量日益增加，价格一度曾经骤跌的鸦片又成了日夜上涨的奇货了。当时的“时报”曾有这样一段话：“现闻本埠土价近来二星期中日见增涨，市上最畅销之印土近已涨至二百十五元一斤，自阴历十月初一起，每斤又加四十元，价格昂贵，至此几同黄金，而各土店销数竟不以此稍减。据一般土业中人云，洋商公司从阴历下月起，年内拟不再售出，须俟明年正月每箱涨至三万元，再行售云”。哈同在这次“禁烟”中，又获得暴利好几百万两银子。这就是他后来独资开设哈同洋行进行大规模房地产投机的主要本钱。关于这个问题，在1931年7月4日《申报》上有一文揭露说：“哈同初到沪时，仅为沙逊洋行司阍之役，厥后与行主（沙逊洋行老板）合营‘土’和买‘土’，其致富始终得力于‘土’”。哈同的致富是“得力于土”，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

强 占 和 反 抗

哈同在贩卖鸦片起家后，用荼毒中国人民搜括来的膏脂，又以租界公董局和工部局董事的身份，更大规模地以低价强

夺上海大片土地，这种肮脏的勾当大部分是和帝国主义严重侵犯和蹂躏我国领土主权的“越界筑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

英、法、美侵略者曾经在1845年强迫上海道官慕久签订了一个“上海地皮章程”，这个章程规定租界内土地的主权属于中国，租地契约须经中国政府加盖钤记，中国政府对租界内的行政、司法等还保有干预权。随着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日益加深，中国保有的主权逐渐被侵犯，以至被否认。租界内实行了完全独立于中国的行政系统和法律制度以外的殖民主义统治制度。帝国主义侵略者以租界作为吸吮中国人的膏脂，勾结中国军阀、官僚、实行文化侵略毒害中国人民的场所，并且还制造借口不断扩大范围。帝国主义扩张的手法之一，就是“越界筑路”——越出“租界”修筑道路。英、美侵略者利用这种手法，于1899年，也就是哈同担任公共租界董事的时期，将公共租界的范围西面由西藏中路扩展到静安寺附近，东面由杨树浦推展到顾家浜（现平凉路军工路交接处）。扩充面积达二万二千八百二十七亩，连前合计公共租界面积达三万三千五百零三亩，比1845年最初划定的八百三十亩，扩展了四十多倍。在这个时期，美英帝国主义把路筑到那里，哈同和其他帝国主义的房地产投机商一起，就跟到那里低价强夺中国人民的土地。

为什么帝国主义在那里“越界筑路”，哈同就能跟到那里低价强占土地呢？原来在“越界筑路”之前，工部局或公董局的董事都预先参与策划制定“越界”的路线图，而哈同担任过十四年公董局、工部局的董事，当然也直接参加和策划“越界筑路”的阴谋诡计。他事先知道了“越界筑路”的

地点，就以贩卖鸦片等得来的黑钱，抢先以贱价强夺路线两侧的土地。他这样做有两个目的：一方面可以为帝国主义筑路另找借口，说外国“侨民”在那里已经有了大量“产业”了；另一方面是贱价侵占农民的土地，等到越界马路筑通，地价暴涨，短期内可获得几十倍、甚至几百倍的暴利。在全市最热闹的南京路一带，哈同使用这种伎俩强占了大片土地，除上面已经讲过的以“慈”字为名的大楼、里弄外，还有永安公司的房屋基地、新新公司（现上海市第一食品商店）的房屋基地等大块地皮。永安公司房屋基地是哈同在1900年5月以一万八千两银子买进的，买进后，附近的马路筑通，市面繁荣，地价就大涨。下一年，他就以年租六千两租给一个姓朱的商人，这样，三年就捞回本钱了。到1916年还以年租五万两的高额租金租给永安公司建造百货大楼。慈淑大楼地基是哈同在1902年11月以十四万两银子买进的，到1931年出租给大陆银行建造大陆商场时每年地租高达二十万两。仅仅从这两个例子，可见哈同以低价强夺土地的方式，从中国人民身上榨去了多少脂膏血汗！

哈同在低价强占土地时，手段十分狡猾，做法十分恶毒。他恃仗帝国主义在华领事裁判权，以租界董事和英国驻华法庭陪审员的身份，勾结租界的捕房律师事务所“高易公馆”猖狂地圈占中国人民的大量土地。对方如果不愿意出售或不同意哈同出的低价，他就先圈占其周围的土地，逼使其失去出路。业主如果再不肯交出产权，他就叫“高易公馆”的律师向业主恐吓诉讼。哈同花园的地皮就是使用这种伎俩抢占得来的。

哈同到上海后，最早是住在自来水桥旁边，和几个帝国

主义分子合住一幢房子。当发了横财后，想造一座花园别墅作为穷奢极欲，追求享乐的地方。他看中了当时还较荒凉靠近静安寺的一块地皮，他的算盘是：这块地方不仅地价比较便宜，而且较市内安静，当花园造好后，市面繁荣了，还可以提高南京路一带的地价。当时在这块地皮的当中是一座占地数亩的德国侵略者的军营，其四周都是农民的田地或坟地。哈同对德国侵略者，是采取相互勾结非法买卖中国土地的手法；而对四周农民的土地，则是摆出了一副“洋人”的面孔，以帝国主义分子的臭架子，勾结当地的地保，强迫农民非要廉价出售给他不可。当时，上海地皮的价格，在东面热闹的地方要数千两一亩，最高的达万两，西面荒僻一些，也值千两一亩，但心狠手辣的哈同只出六百两的贱价。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当然不肯卖掉，哈同就贿赂专门欺压中国人的捕房律师事务所“高易公馆”，先向靠西面的农民进行威胁，恐吓他们如果不卖的话要“打外国官司”“坐西牢”。旧社会是妖魔鬼怪统治的世界，叫这些善良、朴实又无钱无势的农民到哪里去诉苦伸冤呢？只好含着眼泪贱价“卖掉”祖祖辈辈传下来的、以此为生的几亩土地。哈同占据了西面的土地以后，使东面的农民没有出路，也只好被逼交出地契，离开自己的土地。许多农民就因帝国主义分子哈同这一巧取豪夺，弄得颠沛流离，家破人亡。

哪里有帝国主义的掠夺、压迫，哪里就有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帝国主义分子哈同在上海掠夺中国人民的大片土地的罪恶活动，也遭到上海人民的坚决反抗斗争。1907年发生的，并持续了近十年之久的张聋聋向哈同进行顽强的斗争，并取得最后胜利的事件，就是其中的一个事例。

张聿聿是上海一个很有名的中医，他的名字本来叫张骧云，因为他的耳朵有些聿，又是一个为人正派、傲骨峻刻的老人，所以大家亲切地叫他张聿聿医生。张医生有一块面积约一亩左右的祖坟地，座落在哈同圈占建筑哈同花园的地皮当中。1907年夏天，哈同为了建筑哈同花园，就擅自在张医生的祖坟地周围筑起高高的篱笆围墙，并叫嚷禁止张家前去祭祖，企图逼使他迁出这祖坟。张医生对哈同依仗帝国主义势力掠夺上海人民的大片土地的罪行早已义愤填膺，便以“祖坟不能随意移动”为理由拒绝迁让，并一再与哈同交涉。哈同起初被迫答应，从长浜路（现为威海卫路）起开一条小路，让张家出入。可是，帝国主义者总是一贯出尔反尔，说了就赖的。到了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哈同又施展毒计，在张医生祖坟的周围，重打砖石围墙，并填浜断路，同时还施以洋威，进行恐吓。这时张医生对哈同的阴谋诡计更加愤慨，于是又提出坚决的抗议。冒险家哈同见硬的碰了钉子，又用软的手法，拿出巨金进行诈骗，中国人民的领土主权，中国人民的民族自尊心难道用几个臭钱可以买动的吗？不能，绝对的不能。张医生又给帝国主义侵略者碰了一个更大的钉子，甘词、厚币、危言、恐吓都未能使张医生动摇，这就更使哈同嫉恨，老羞成怒，最后抬出臭名昭彰的“治外法权”的王牌，向会审公堂提起诉讼。哈同这个颠倒黑白的流氓行为，引起上海广大市民的义愤，纷纷支持张医生的正义行为，抗议帝国主义的无耻勾当。张医生在会审公堂开庭时，不仅没有退让，反而理直气壮的进行反控诉。会审公堂虽与哈同狼狈为奸，但迫于人民压力，怕因这块坟地而燃起群众性反对帝国主义的怒火，所以不得不在1916年8月29日判决：哈同